

读书·行路·感悟

——医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杨海燕剑桥访学有感（二）

国际会议受邀发言——新的起点

我的合作导师 James A. Secord 教授，“达尔文通信研究计划”的主任，在访学期间对我的研究项目进行了直接、有效的指导。“进化与进步思想史研究”项目以罗伯特·钱伯斯《创世自然史的遗迹》（1844 年）的写作与传播为案例，对“进化”与“进步”这两个重要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思想史考察，进而理解进化生物学与更广泛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互动。

此外，Secord 教授和我于 2009 年 3 月从英国文化协会成功申请下来“永远的达尔文网络”项目。网络的主旨是在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相关研究人员与剑桥大学 HPS 人员之间建立长期的沟通与合作，以人类进化问题为核心研究中国和英国的案例，探索在交流技术快速发展之时达尔文主义的全球传播方式，在跨文化背景下解决当今世界各地有关进化论的争议。它的长期目标是：1. 鼓励以新的方式考察世界范围内达尔文等人著作的翻译和接受；2. 在剑桥 HPS 推动更广泛的跨文化课程计划；3. 在北京大学推动关于进化生物学的历史与哲学的课程计划；4. 在与达尔文相关的研究领域建立和维系中英双方学者的联系。此项目将主要资助在北京召开“达尔文传播”国际研讨会（2010 年 8 月）、我赴剑桥短期合作研究、中英文论文的发表以及达尔文通信选集《进化》的翻译出版。

在剑桥访学期间，我已经完成并发表两篇书评文章：1. Darwin and His Sacred Cause, *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 Vol. 4, No. 2, June 2009. P151-155; 2. 达尔文的多重形象与中国意义，《科学文化评论》，第 6 卷，第 4 期，2009 年 8 月，第 36-42 页。

以“达尔文在中国”为主题，已经受邀参加了两次国际会议，分别贡献了学术文章：1. Encountering Darwin and Creating Darwinism: The Chinese Case（遭遇达尔文与创造达尔文主义：中国案例），“达尔文对科学、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国际会议，葡萄牙布洛加，2009 年 9 月 9 日-12 日；2. Varieties of the Early Recep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Darwin in China（中国对达尔文的早期接受和挪用的多样性），“达尔文、医学与人文学”研讨会，英国埃克塞特，2009 年 9 月 18-19 日。

作为受到会议全额资助的学者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并与各国学者进行交流，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

跨文化的医学人文——交流与对话

医学人文作为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学术领域，在英国的历史并不长，但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达拉谟大学（Durham University）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相继成立了医学人文研究中心，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医学人文学在英国的社会建制。2009 年 4 月我对达拉谟大学的医学人文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Medical Humanities）进行了访问，与中心主任 Martyn Evans 教授建立了直接联系。此中心的主要研究项目为“医学与人的繁荣”（Medicine and Human Flourishing），由 Wellcome Trust 资助，额度 180 万英镑。此项目致力于理解医学的人文方面，探索健康及医学这两者与更广泛的幸福概念之间的关系，探讨创造力与艺术对健康生命的贡献。主要分为四个主题：充分理解对人性、健康与繁荣的科学说明与经验说明之间的分歧的本质和程度；充分理解这一分歧对临床保健和卫生政策的影响；对临床保健进行彻底地重新定义，承认人文学在其中的根本位置；在对人的繁荣的两种不同理解中，探索一方反思和吸取另一方的观



念和实践的可能性。

5月我访问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人文学与健康中心(Centr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Health),参加了相关的学术活动,与中心主任Brian Hurwitz教授进行了多次交流。此中心的主要研究项目为“疾患的边界”(The Boundaries of Illness),亦为Wellcome Trust资助,额度200万英镑。此项目考察健康与疾患的个人及文化表现,以及健康与疾患两者之间的边界,探究人类对健康的体验以及对疾患的回应。中心汇集了来自文学、哲学、历史、视觉艺术、影视研究、临床心理学、医学及护理学的学者,对以下六个子课题进行研究:“对疾患的叙事:文学与陈述”;“焦虑和失调”;“医学绘画和摄影的个案研究”;“护理与认同:跨越边界”;“精神病诊断的文化和历史影响”;“健康的概念”。中心还将于2010年9月启动医学人文学的硕士培养项目。

Martyn Evans和Brian Hurwitz两位教授已经欣然接受邀请,拟于2009年10月医学人文周期间访问北大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商谈机构之间的未来合作事宜,并参加在北医举办的“东西方医学人文学科对话工作坊”(New Approaches to Medical Education: Dialogu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n Medical Humanities, 2009年10月25-28日)。届时他们将分别报告“生命循环与人文学:将人文学整合进医学课程的建议”、“疾患的边界:一个医学人文学的研究和教学计划”,与各国学者一道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医学人文教育和研究展开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

异乡是镜子——对视与行动

2009年是剑桥大学建校800周年,她的31个学院、150多个系科学术单位、8个博物馆、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和植物园,举办了琳琅满目的学术纪念活动。我参加了诸多与自身学科相关的学术会议、研讨班、工作坊,还有各种展览和演出,不一而足。剑桥的800年历史,传统与革新交织、反叛与维护并存,其间产生了多少思想巨匠,仅三一学院就有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虽然隆重的800周年纪念被人视为剑桥大学筹资的由头,关于剑桥衰落的评论也时有耳闻,但是无可否认,有趣的人物、启迪心智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的活动比比皆是。在访师会友的过程中,对剑桥的古与新、人与事、学问与生活多有体会。“学者自治”、“学术自由”这些原则不再抽象而遥远,之前的悬想和预判或坐实或修正或摒弃。一直自认为“去国”却未“怀乡”,然而在异乡这面镜子的映照之下,逐渐对自己的“国”与“学”生出沉甸甸的责任感来。

在这种责任感驱动之下,我参加了很多关涉文化交流的活动,以期反观正照、有所裨益。自2009年起,我开始担任剑桥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Cambridge Studies)的理事以及《剑桥研究杂志》(*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的编委。剑桥研究学会是以中国访问学者与博士生为主体的学术组织,致力于中英高等教育机构与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学人的共识。我积极在中外学人之间铺设桥梁,为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构建对话平台。担任《剑桥研究杂志》2009年第3期和第4期的执行主编,分别聚焦于“重温两种文化之争”及“达尔文与进化”议题,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讨论。在“中国对话:剑桥中国研究讲座系列”(China Dialogue: Cambridge Chinese Research Seminar Series)中或主讲或主持或评论,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剑桥与中国之间的学术往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885年“剑桥七子”——剑桥大学七位学生——曾赴中国内陆传教,汉字罗马化系统的创制者是剑桥的首任汉学教授,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更是和剑桥渊源不断;而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郭嵩焘、丁文江、伍连德、徐志摩都与剑桥有这样那样的遭逢。正是在这种往来与对视之中,一种所谓的镜像经验产生了:既以自己的眼光理解对方,又以对方的眼光调整自身。互动的契机使断裂的时间发生勾连、使隔绝的空间得以敞开,形成一种有机的认知和交道结构。而类似的结构不仅存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同样存在于男人与女人、患者与医生、自我意识与社会认同之间。

光阴荏苒,剑河的水光依然潋潋,河畔仍旧有牧牛在反刍,叹息桥还是能够惹人发出一声叹息。徐志摩

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诗人虽然易作惊人之语、常发夸张之慨叹，但这一份欣然领受的心情大抵是不错的吧。对我来说，有一部分时空取自剑桥同时又驻留于剑桥，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参照系。

（医学哲学教研室 杨海燕 撰稿）

留学访问一年之笔记

2009年9月，北京秋意渐浓，但我的心情却如盛夏般灿烂，因为这一天，国航983次航班即将承载着我的喜悦和憧憬漂洋过海了！

得益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我有幸前往位于太平洋西海岸的天使之城——洛杉矶，去著名学府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一年的访问学生。如今期满归来，回首过去的一年岁月，不胜感慨。

身在遥远的异国，驻足陌生的街头，张不开口的哑巴英语，最开始的一周时间里，我郁闷、沮丧、懊悔来到这个大农村，现在想想，这也许就是“文化休克”，低迷的情绪蒙蔽了我的双眼。不过上帝眷顾我，我很快结识了一帮跟我身份差不多的中国学生，通过他们，我又认识了很多当地的华人朋友，他们热情的招待我们这些来自祖国的学子们，热腾腾的中国饭菜，贴心的安慰，鼓励的话语，让我们倍感家的温暖。从此我不再怨念，而要积极的去探索和适应这个新环境。

九月初正值UCLA的暑假，诺大的校园分外安静。UCLA校园的美，不仅体现在她别具特色的建筑风格，错落有致的规划格局，还体现在很多人性化的细节，比如每个楼下都会有自动贩售机，自动换零钱的机器，微波炉等，每个楼的一侧都有便捷的轮椅通道；以篮球、棒球等运动出名的UCLA，其丰富的文体娱乐场馆令我倾心，而且这全部都是免费的！

UCLA的学生是她的名片。他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闲暇之时更独具创意。有着悠久传统的内衣奔跑大赛，就见证了这群学生的青春与激情。

UCLA的学术久负盛名。我所在的临床心理学系，居世界排名首位。我在指导老师Bradbury教授负责的婚姻家庭研究中心学习。教授和善可亲，我们每周单独会面一到两个小时。我首先参加了Bradbury教授的一项针对低收入家庭夫妻关系的研究。经过两个月的正式培训，并考核合格之后才能“上岗”，所做的工作主要是看录像，进行行为编码分析。

除了旁听课程，参加研讨会之外，我也开展了自己的课题。我对在美华人的婚姻现状非常感兴趣，在我的导师胡佩诚教授和Bradbury教授的指导下，拟定了研究计划，希望深入了解华人夫妻在面临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婚姻观及夫妻关系的变化，以及相关的影响因素。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倾听了大量来访者丰富有趣的情感经历和在异国奋斗的精彩故事，极大的充实了我的研究课题，也使我本人获益匪浅。

赴美一年，收获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有我个人的成长。在美国的街头，我学会了用微笑这张名片；在跟美国同学的交往中，我学习到了自信、活泼；在跟华人朋友的交往中，我明白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在对美国文化的接触中，我体会了“发达社会”的含义。

回首一年，心里沉甸甸的满是感恩。感谢祖国，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遇跨出国门深造；感谢同路的朋友，我们的旅途不再寂寞；感谢在美的华人朋友，虽然不太可能再次相逢，但你们永远占据我们内心最温暖的一角！

一年的感慨，唯有“感恩”二字已足以……

（医学人文学系医学心理学博士生 徐红红 撰稿）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见闻

笔者于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以访问学生的身份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进行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是美国医学史研究的重镇,它成立于1929年,现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共九名,研究领域广阔,包括美国、欧洲、非洲、东亚等区域的医学史和疾病史,研究时间跨度从中世纪到现代。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史教育始于19世纪末,当时闻名美国的医生奥斯勒(William Osler)面向医学生开设医学史课程,他希望通过医学史教育来影响医学生的职业品质,并提高他们作为未来医生的文化修养。这在霍普金斯医学院成为一个传统。1925年,霍普金斯的另一位名医韦尔奇(William H. Welch)提议在医学院设立专门的医学史职位,1929年医学史研究所成立。1932年希格里斯特(Henry E. Sigerist)来到霍普金斯主持医学史研究所的工作,他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医学史教育理念引入霍普金斯,建立了完整的医学史课程体系,并创办了医学史期刊《医史通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医学史自此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现在医学史研究所的教育主要面向两部分的学生:一是医学史研究所以及科技史系的研究生,二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医学史研究所和霍普金斯大学科技史系有密切地合作,在研究生培养上尤其如此。医学史专业的研究生需要学习科技史方面的一些课程,同样,科技史专业的研究生也要接受一些医学史教育,这两个专业的研究生的知识拓展以及学术交流都很有益处。公共卫生史和疾病史是医学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应该受到公共卫生专业学者和研究生的重视。霍普金斯医学史研究所同公共卫生学院在研究生教育上也进行合作,双方的部分课程均对对方的研究生开放,例如现在开设的“1750年以来巴尔的摩公共卫生史”(Life and Death in Charm City: Histories of Public Health in Baltimore, 1750 to the Present)由医学史专业开设。此外,对医学生的医学史教育的传统现在仍在继续,医学生可以根据兴趣选择学习医学史的课程,在本学期有一门课同时面向医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和其他的医学生:“医学史I:从古代到科学革命”(History of Medicine I:Antiquity to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医学史研究所和科技史系共同开办的讨论班,笔者在霍普金斯时参加了这个讨论班的活动。讨论班由双方轮流举办,每周一次,主题为医学史和科技史的文章阅读与讨论。他们邀请来自欧美很多大学的学者报告他们的一项研究,参加讨论班的教授和研究生就主题和作者进行交流,这不仅开阔研究视野,而且很多这样的讨论对笔者的研究方法和视角都很有启迪。

在医学史研究上,该研究所也有很好的条件,笔者对此感受尤其深刻。以笔者所关注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领域为例,医学史研究所在的霍普金斯大学韦尔奇图书馆(Welch Library)中,这方面相关的图书非常丰富,此外,笔者还可以利用霍普金斯大学其他各图书馆的藏书资源。各图书馆还有非常齐备的学术期刊,包括医学史领域所有重要期刊。在电子资源方面,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库资源非常丰富,在学校范围内对所有的使用者免费开放。另外,霍普金斯大学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仅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研究人员在使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资源上也尤其方便。在这些地方搜集的资料给笔者目前的研究有莫大的益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在医学人文学科上的研究虽然主要集中于医学史方面,但是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在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以及医学人文学方面有浓厚兴趣,这些研究人员分散在医学史研究所、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学系等,他们之间也在共同的研究领域上合作交流,来推动这些学科研究的发展。这种跨学科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值得我们借鉴。

(医史学中心博士研究生 史如松 撰稿)

地址:北京大学医学部逸夫教学楼715室

邮编:100191

电话:010-82802512(传真)

电子邮箱:medhum@163.com